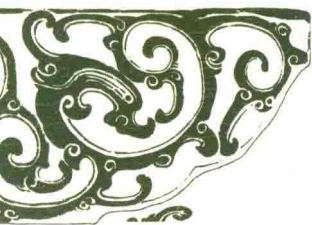


中古文论的致思方式

——张甲子——著——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曹胜高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古文论的致思方式

——张甲子——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论的致思方式 / 张甲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7525 - 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古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803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曹胜高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75
插 页 2
字 数 258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袁行霈 王 宁 迟 铎 陈俊民
赵世超 郭齐勇 朱凤瀚 刘学智
林乐昌 王子今 贾二强 李继凯
张新科 李 浩 党怀兴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为祥 王 晖 王晓鹃 周淑萍
曹胜高 黑维强

主 编 曹胜高

“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曹胜高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成为我们的历史传承；也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我们的精神标识。这些经验和传统，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的历史基础和文化积淀，而且必然会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和学理支撑。

研究古代中国，一是要以历史视角观察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更为理性地思考古代中国在国家建构、行政调适、社会整合、文化建制方面的历史经验，清晰地揭示中华文明何以如此，将之作为世界文明史的基本结论。有了准确的自我认知，便能以学术自觉推动文化自觉，广泛地参与未来全球文明的共建。二是要从学理角度辨析古代中国演进的规律性特征，概括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总结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作为世界秩序建设的理论支撑。有了清醒的文明定位，便能以学术自信支撑文化自信，全面地主导未来世界秩序的重建。

这就需要当代的学术研究者，能以赓续中国学术的学脉为己任，以新的人文主义情怀面对一切历史经验、思想进程、文学创作，注重以新方法、新材料、新思路、新视野审视中国固有之学问，通过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推陈出新，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温故知新，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守正创新，以历时性的研究、共识性的成果，推动古代中国研究的不断深入。

基于上述考量，我们编辑出版“古代中国研究丛书”，意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基本典籍与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重大关切进行跨

2 中古文论的致思方式

学科综合研究，选取古代中国在文学、历史、哲学以及艺术等学科发展演生的关键环节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致力总结其“所以如此”，更要着力分析其“何以如此”，资助出版一批具有前瞻眼光、原创意识、深厚学理的研究成果。期待与同道者合作。

2015 年 12 月 8 日于长安

序

曹胜高

古代中国之思想演进，其关节有三：一为东周诸子学说之生成，其奠定了中国思想之主要命题，如性命、情志、言意、形神等，一如胎之初肇，其端万方。然此间名实之思未备，诸子未能尽他说之短长而为之辩通，常以己意度之，遂生无君父之讥、拔毛不为之讪。由此俯观秦汉之于思想史之贡献，在于秦统一文字、定律令而天下所指所称渐同，在于汉释六经、明训诂而学术话语遂通。二为魏晋玄学之辨析，绍续周秦未解之性情、汉儒推崇之礼乐，合人生之体验而论之。名实定则理可辩，诸家之论方可在同一层面进行。故魏晋之论文质、言情志、论形神、明本末、辨体用，言不游移、理不枝蔓，就事论事而能深析。三为宋明学理之综合，赓续玄学致思方式，合三教之学而大观之，以学理之思关乎人心，论天下之辩在于立身，槃深中国思想之根柢，至于心性；峻茂传统学理之枝叶，关乎人生。

魏晋思想之辨析，非思想界之自说自话，实乃中华文明理性认知之自觉。周革殷命，以人文代神文，人之主体性渐显，西周成于礼乐而东周著于典籍。诸子立论，注目于天人、人人、身心之认知，以理性观乎人文。魏晋之学，乃以学理深究经说，遂令汉之家法、师法固守成说而不思其义之弊，端然明晰。魏晋学者以学术理性辨析其立意，多重形上之辨，而少关注人生，实以不用立论、求无用之用，实以理性观乎学术。由此观察宋明理学所思所传，乃即经说立意而求知，就行事体察而自修，诚其心，明其行，以理性观乎文化。故人文理性，遂使中国思想重人本；学术理性，乃使中国逻辑能形上；文化理性，终使中国修养重人格。

魏晋之学术理性，于中国文学之创作影响甚广，于诗则重理感，于赋则求写实，于文则尚构思，于小说则求其观物载言。其最有益于中国文学进程者，在于理性观察文学创作之形态、文学演进之通变、作家才性之高下，或辑之在册，或言之成篇，或撰为专著，成为文学理论之自觉。是以后世之论文学，不能越曹丕、挚虞、陆机、萧绎、刘勰、钟嵘之论而言之。其间所涉及创作、构思、作家、文体之研究，前贤今人已广为辨析，论之多矣。

文学思想之研究，归根结底乃思想之研究，只有纳入到思想史范畴，才能理清其端绪，明晓其学理。只有依据思想变动观察，方能知其何以演进、如何演进。若以学术理性之形成观察魏晋乃至隋唐文学思想的演进，就会发现文学思想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不仅参与其进程，且促进其发展。由此观察，汉魏六朝思想史之诸多命题，如何进入到文学研究之视阈，如何成为文学观察之视角，如何推动文学认知之深化，则可进一步探究，以明文学概念之生发、文学观念之深化、文学风尚之养成，如何源自思想辨析而又滋养思想辨析，互根互生，促成文学思想之变动。

魏晋文学思想研究既多，诸多命题皆有所论，必须选取若干魏晋思想界关注的概念，因其学术讨论而渐为文学观念所接受，成为雕塑中国文学认知之刻刀，累积而成文论之新角度，进而影响后世之文学风尚。探赜幽眇，钩深致远，方能推动学术研究之深入。此既需要了解文学演进之基本走向，又能体察文学与思想的细微共振，还要能循思想之轨迹准确勾勒，非勤学、博见、洞察者不能为之。

甲子读书期间，先后进行了文献学、古代文学与思想史之学术训练。其硕士所撰《两汉铭文研究》，搜集周秦汉铭文而论之，有益清通之思；又撰《汉赋与汉代服饰》，能以汉赋所记而命汉服形制，有助博采之功；初涉魏晋文论，遂就画论、书论而观察文学风尚，有成于洞察之力。其深而思之，乃选取清浊、隐秀、自然之命题，以思想与文学互动为视角，观察思想于文学观念之影响，由此辨析文学思想之概念形成、逻辑建构和学说表达。取一勺而观沧海，因一斑而窥全豹，着力思考清浊、隐秀、自然等观念如何从思想史位移到文学史中，以思想认知启发文学风尚，由此观察中古文学理论建构的致思方式，以求中国文学研究范式之创新。

研究范式之创新，既需搜罗之力，又需明断之功，还要能寻途于幽昧之中，方能有所建树。就其论文观之，其言隐秀，能博通古今，由先秦

之言隐喻而论至宋齐复古，皆翻检古书所得一手材料，用力甚勤。清浊出于气论，见诸人物，玄虚难定，其为才性说之根本，进而成为文学高下之参照。音分清浊、字分清浊、人有清浊、文有清浊，清浊之于文学影响广矣。然自古论者少，若要明其端绪，则需细辨其资料之缠合抵牾，其言人物品鉴理而通，言审美风尚辩而深，言尚清追求细而广，笔起笔落，清浊之理论已通。中古之论自然甚夥，若能切中肯綮，于前人自然之论中别出心裁，而论自然观念于中古文学风尚之影响，最能见乎学者之功底。其能以形似言山水之构思，以体悟论诗风之变动，以法度观察唐宋诗歌之内在理路，足见其于文本体察之细、于文学感悟之深。

为文为学之要求，既重其学术规范，更重其学术功底之培植。甲子论中古文学之致思，乃其为学之初步，其间已见学术根基。若能持之以恒，不离不弃，必将有所广益。观其又随赵轶峰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关注公私观念之于中国思想及制度之作用方式，颇感欣慰。声之随响，其应也远，其必将有新的成就，余姑待其后来居上之新作。是为序。

2015年10月19日于长安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清浊”与中古文论的意识升华	(3)
第一节 “清浊”观与汉晋人物品鉴论	(3)
第二节 尚“清”的思想渊源与理论演化	(24)
第三节 清浊分野与中古诗歌的审美追求	(42)
第四节 中古诗歌创作对“清”美的认同	(62)
第二章 “隐秀”与中古诗学的审美共识	(82)
第一节 先秦诗文隐喻现象及文学功能	(85)
第二节 “隐”之渊源与《文心雕龙》的理论架构	(101)
第三节 “隐”之总结与复古文论的省思	(120)
第四节 南朝诗风新动与崇“秀”观念的生成	(140)
第三章 “自然”与中古文学的内容变迁	(161)
第一节 “体自然”与玄言、山水诗的消长	(162)
第二节 “形似”视野与山水诗的空间构式	(178)
第三节 “自然”与唐宋诗学的内在规范	(193)
第四节 “自然”与唐宋古文的内在法度	(208)
结语	(222)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39)

导 论

在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中,^①文学观念一直是很丰富的,其对文学审美意义的认识逐步明晰,大量的创作实践也进行着多样化的尝试。相比于上古,中古涌现出崭新的文学观念,要比旧有的总量还要多得多,且不说散见于原始史料与论者随笔中难以确切计算的,只单从《文心雕龙》一书中,我们就可以梳理出十数种,它们又绝非刘勰一人的奇思妙想,其身后必然有着时代赋予的纵深背景,在肯定中切合着时人的审美需要。而对那些本就由创作者提出的文学观念,如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陆机的“绮靡”、谢朓的“圆美如弹丸”等,更是代表了主观上的审美理想。

研究中古文论,如果将对文学观念的解读与此时的哲学思想、社会观念、人生理想等结合起来,会挖掘出更深广的讨论空间。按照陈寅恪的说法:“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②每一种文学观念里都潜藏着文化与文明的意味,牵扯到复杂且神秘的审美情感与精神世界,因此,解释它们也就是在解释历史、解释精神。这一时期绝大部分的文学观念都有对哲学的沿用或借鉴,如“言意”“象意”“自然”“形神”“阴阳”“清浊”等,即使在讨论文学的层面展开,其哲学痕迹仍宛然可见。同时,这些文学观念又以感性体悟式居多,处处浸透着当时的社会思潮、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等,如要注意与人物品鉴、门阀制度、宗教信仰的联系,借助于这些,我们才能够更全面地看出这些文学观念在处

^① 从狭义上来讲,本书讨论时限上起曹丕代汉立国(220年),下至隋唐嬗代(618年),以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为先例,将魏晋南北朝及隋划为中古的核心时期。但为论述更全面,在时间断限的广义上,将其前推至两汉,下延及中唐,甚至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先秦、两宋及元明史料,亦有参用。

^② 陈寅恪:《与沈兼士函》,引自《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鬼”字原始意义之使探》,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2页。

于不同的语境和位置时，论述者赋予其不同角度的意义的良苦用心。

本书选取了“清浊”“隐秀”“自然”三大议题，以其为中心，使得讨论的焦点更为集中，主要关注其生成规律、体系结构与流变特点，即从思想发展脉络的钩沉中，寻绎它们的内涵变化。

其一，将“清浊”与中古士人的审美趣味、诗歌的情感基调、气象境界、艺术风貌等联系，由此说明“清”超越“浊”，或者说是先放弃了“浊”，再推得“清”获得了艺术格调。在其中，无论是儒家的清丽、道家的清虚、还是佛教的清空，莫不如此。再加上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陆机的“沿浊得清”、陆云的“清省”，以及在钟嵘的《诗品》中，目标一致地对“清”的明确倡导，又从选辞、描景、含情与造境等方面，强化了中古诗歌对“清”美认同的大趋势。

其二，“隐”义来自于对经之隐的发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罗列出十数种不同角度的命题，并逐一加以阐释，共同说明“隐”这种微妙的艺术表达原则。“秀”则是南朝诗歌审美风尚的转折点，在对秀句、秀象、秀境的主观追求中，形成了迥异于汉魏古诗的新诗风。南朝诗正是经过了“隐秀”观念的打磨，才能更为圆融地去处理诗歌情理内敛与境象外露之间的关系，并在初唐百年间的继续努力下，到“二张”时渐成兴象玲珑、句意深婉的唐音，亦步亦趋地定型为诗歌的审美共识。

其三，两晋代际的文风在“自然”观念的浸润下出现明显转变。其理论根源在于，两汉时人所论的“自然”是天人感应学说中的一部分，魏晋玄学则将其转变为“自然之理”，其来源于宇宙万物本身，人可与“自然”同构，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意识下，东晋后玄言诗、山水诗便渐次而起。尤其是将山水作为自然现实的依靠，“形似”观念遂成为山水诗画的固定表达范式。与此同时，“自然”也被视为是一种创作精神，“自然”既是文之道，也是文之理，这体现在中古散文的发展过程中。

本书中所论的“清浊”“隐秀”“自然”，既具有原型意味，还兼有丰富的实践性品格，甚至可以再解读出美学化、伦理化、道德化等意味。中古文论承上启下，既是对先秦两汉文论的整合提升，也为隋唐之后文论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参照。不仅如此，中古文论更是中国传统文论致思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其超越了先秦文论片段式、缺乏主观意识的理论朦胧阶段，转而进入到有主体的审美、有整体的观照、有意会的论说中，逐渐塑造出中国传统文论的独特风致与别样情怀。

第一章

“清浊”与中古文论的意识升华

有关“清浊”的观念出现得很早。其最初与哲学关系密切，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与逻辑演进过程，后来进入到文学观念中，有了许多复杂的含义。一是具有直觉性，“清浊”观念的内涵多来自于感悟式的判断；二是具有灵活性，尤其是独立的“清”，或多义、或组合、或引申，再作以有新意的发挥，孳生出一个庞大的命题系列。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况，我们要想对“清浊”下一个能包举一切的简明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上佳之策是针对具体的情况，回答若干个“所以然”或“所当然”的质询。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分析，本章试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为之。

第一节 “清浊”观与汉晋人物品鉴论

在汉晋人物品鉴论中，“清浊”是判断一个人高下贵贱的首要依据。如酈炎《见志诗》言：“贤愚岂常类，禀性在清浊。”^①王充《论衡·非韩篇》亦论之：“凡人禀性也，清浊贪廉，各有操行，犹草木异质，不可复变易也。”这一依据如何形成？“清浊”何以成为人物品评的标准，并成为社会人才判定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z从本源上对“清浊”的概念加以辨析，由此审视其如何萌芽于气论，在两汉成为审视天人关系的基本视角；又如何转为对人的气质审视；以及在此过程中，“清”又是如何超越了“浊”，成为中古社会的基本命题。

^① 《后汉书》卷80《文苑列传·酈炎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7页。

一 上古宇宙论中的“清浊”观

“清浊”在先秦时，已经成为人类观察宇宙形态、思考物质运动的基本概念。两者对举，代表物质具有的对偶质性，是先民们在实践中的经验与总结。《国语·郑语》载史伯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①谓之天地物质由他物和合演化而来，是多样性的统一；《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史墨言“物生有两”，^②说明宇宙万物皆由相反相辅的两方面组成。这是哲学物论的思维模式，诸如大小、上下、阴阳、刚柔、动静等，概莫能外。晏婴也曾论事物之间的关系：“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③以食品“和羹”、音乐“和声”为例，阐释事物中两元因素相反、相济的道理，“清浊”被置于众多要素之首。再有《邓析子·无厚》：“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④如果说异同是对性状的区分，是否是对价值的界定，白黑是对形象的描述，那么“清浊”则是对事物品类的判断。

根据先秦文献进行概率统计，以“清浊”对具体物质进行状态性的描述时，绝大部分集中于对水、气这两类物质，而水与气，又恰好是在宇宙从混沌的初始状态到变易出天地万物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两种介质。前者理论以《太一生水》为代表，后者理论以《淮南子》为代表。由此看来，“清浊”是宇宙生成论中至关重要的链接性命题，在以“道”为宇宙本源，以“太一”“太易”为宇宙初始的基础上，“清浊”贯穿着宇宙如何生成、如何变化的漫长历程，并将这种历程中的辩证逻辑与天人关系相结合，等同于人类的生存法则以及社会理想秩序的建构。

“清浊”最早即用之于论水，从视觉感官上看，“相彼泉水，载清载浊”“原隰既平，泉流既清”，^⑤水有时与污秽混杂令人厌恶，可静水又能自除污秽，使水清如鉴，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喜欢“清”而厌恶“浊”，皆希望能有如水般的品性。如《老子》第十五章言：“孰能浊以静之徐清？”

①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0页。

② 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19页。

③（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49《昭公二十年》，（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94页。

④《邓析子·无厚》，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编·子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⑤（唐）孔颖达：《诗经正义》卷15，引自（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495页。

元吴澄注云：“浊者，动之时也，继之以静，则徐徐而清矣。”^① 老子主清去浊，正为“天得一以清”“天无以清将恐裂”，^② “清”是根本，是万物动静循环的开始，将“清”的水之本性，借此推及万物之理与人生之道上。又如庄子所论“清而容物”“清白”等，亦皆以“清”为美、以“清”为真。不过，老庄讲的“清浊”只存在着简单的激浊扬清倾向，多是感性的象征手法，并不十分强调整理性上的清浊之辨。

以“清浊”论水的质性，在两元分殊上一直比较模糊，这也是此条线索发展缓慢，且最终在内部出现矛盾的根本原因。水的地位上升，出现在《管子·水地篇》，以水为“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进而“凝塞之为人”，^③ 认为万物皆依赖“水”生，并以各地不同的水性分出“清”与“浊”，“美恶贤不肖，俊之所产也”“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④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清则民心易。需要指出的是，《管子》中以“清浊”论水，只是其水论的一部分，“水”仍是要依附“土”而行，“水”没有上升到宇宙本源的位置，更未以“水”去追问宇宙的源头。这不过是时人从最常见、最多变的自然现象中，寻找到了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并能适用于人生及社会而已。^⑤ 归根结底，《管子·水地篇》中的水分清浊，与老庄是相似的哲学逻辑，仅算是思想上的一种譬喻，没有过多的理论建构。

当以“清浊”论水的模式试图进入到宇宙论框架中，它的缺陷很快便凸显出来。其根本原因是，“清浊”论水使用的是二元分立的方法，也就是认为水既可以为“清”，也可以为“浊”，甚至两者之间能够互转。如《太一生水》以热冷、燥湿论水的“反辅”，“四时复相辅也，是以成寒热。寒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燥。湿燥复相辅也，成岁而止。”^⑥ 《太一

① （元）吴澄著：《道德真经书》卷1，载《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四·道家类》。

② （三国·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6页。

③ （清）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14《水地篇》，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1页。

④ 同上书。

⑤ [美] 艾兰著，张海晏译：《水之德与道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2页。

⑥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生水》中讲的“水”，是仅位于“太一”之下的宇宙本源，它“反辅太一”，先生出天，后生出地，再生出四时，后有“寒热”类于清，再有“燥湿”类于浊，和合相辅最后生成万物。可见，“水”是高于宇宙中任何物质的本源，是抽象性的概念。可它毕竟从具象的物质之“水”的概念上升而来，有思想的残存不可避免。所以，我们看战国乃至秦汉文献中，“水”有时仍指的是五行元素中的“水曰润下”，当水、火也被理解为具有二元对立性时，“水”到底孰清？孰浊？差不多搅和成了一笔糊涂账。因为若以阴阳为固定的衡量标准，应是阳在上、阴在下，清为阳、浊为阴。依据《尚书·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的五行说，^①水应为浊，火应为清，也就是“水之极浊便成地，火之极清便成风霆雷电日星之属”。^②但是，在《太一生水》中的“水”具有清浊两性，而在五行中的“水”却只归属于浊性。当然，此处的清、浊没有高下尊卑之分，但这类试图将阴阳与五行相配所导致的失调问题，却很难得到完满的解决。

以气之“清浊”作为思考的理据，就通顺很多。其实在逻辑体系上，论水与论气的阐释层面是一致的，在它们之上是“道”“太一”“太易”等，这些都是对宇宙源头进行的纯粹理性思考，而“水”与“气”则是从多样的自然界中，归纳出的抽离了感性直观，却仍然是实物的符号，尽管它们也是想象出来的，但这种想象并没有脱离客观存在。如上所论，以“清浊”论水难以为继，就是因为既将“水”视为抽象的宇宙本源，又同时将其视为是生成的具体物质，两个层次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而以“清浊”论气，这种矛盾便不复存在。有此缘由，战国至秦汉间的宇宙生成论在经过抉择后，有“清浊”之辨的“气”论开始大行其道，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洪流。

观点首见楚简《恒先》，强调“清浊”与“气”的自生：

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第1简）

气是自生，恒莫生气。气是自生自作。（第2简）

①（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2《洪范》，第188页。

②（南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理气上·太极天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页。

生之生行，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异性，因生其所欲。察察天地，纷纷而（第4简）复其所欲。（第5简）^①

《恒先》的观点，是认为宇宙初始是“恒先”，此词在《黄帝四经·道原》中也有，其意基本等同于“恍兮惚兮”之道，是为宇宙的起点。之后“恒先”生出气，宇宙内分出有无，将自生的“气”定位为宇宙的本源。然后“气”分了清浊，天地就出现了。这里的“清气”“浊气”自生而出，气化之初宇宙内一片混沌，清浊二气融合，“求其所生”后，二气化成天地，并充盈天地间，让天地同样具有了自生的欲望，故“复其所欲”，万物皆成。

《恒先》整合了先秦众多关于宇宙学说的话题，这也是战国末年到西汉哲学发展的大趋势，杂家辈出，意图在诸子百家曾林立天下的局面上，在经历了长期的争论后，彼此吸纳兼容，有所采撷，有所承接，从总体上综合的观点愈来愈多，从而建构出一套完整的宇宙图式。这在《淮南子·天文训》里能看得更为清晰：

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浊浊，故曰太昭。道始于虚霫，虚霫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②

“太昭”是宇宙原初的混沌状态，乃后有道、有宇宙，宇宙生气后，先经天营地，有天地后分阴阳，分阴阳后成四时，四时运转后有万物。《淮南子·天文训》所言的“清浊”，比之《恒先》中的“清浊”，有两点不同：

其一，《恒先》是先浊后清，先地后天，与《黄帝四经·十六经·观》中“下会于地，上会于天。……待地气之发也，乃萌者萌而孳者孳，天因而成之”的模式相近；^③《天文训》则先清后浊，先天而后地，顺序

① 李零校定：《恒先》，引自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293页。

② 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卷3《天文训》，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65—166页。

③ 国家文物局古代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